

戴 震

——十八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

周輔成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武漢

內容提要

戴震是中國哲學史上有最鮮明色彩的唯物主義的啓蒙思想家，也是和反動勢力作鬥爭的戰士之一。戴震思想的最重要部分，乃在於他把“理”聯繫於客觀物質世界變化的規律（分理），並把“理”的認識視為是行為的先決條件，這是站在唯物主義的理性主義觀點上的。當其說明社會時，注重“理”與人民的情欲是一致的，社會中的“理”，即人民情欲上的“理”。這是唯物主義的人道主義。他以此抗議當時統治階級的壓迫。本書系統地介紹了戴震的思想及生平，並給予適當的評價，可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同志們參考。

戴 震 ——十八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 周 輔 成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發賣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新新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 $\frac{1}{32}$ 開 · 2 $\frac{11}{16}$ 印張 · 2箋瓦 · 51,000字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製
印數：1—12,500
統一書號：11106·29



戴 震

山高水長無以言之
國朝重文輕武 誰復費口舌
戴震

戴震

歙縣許氏藏

戴震遺墨 (一)

去冬寄提標中營舍姪處書今年二月廿日
始自杭赴任想亦送到矣茲有信希轉寄
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于秋初乞假
南旋宦是不復出也擬卜居江寧僕居定當開
明以便音問相通吾

兄尚未得實地而素性方正則難與俗諧然
君子斷乎主于中者先求不失己有急退
無急進也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
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令人無論正邪盡以
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
作頃未得人抄寄茲附致五經算術一部其
九章算術尚未印出順候

逆祉馳溯不宣上

若膺賢弟足下

震頓首四月廿四日

戴震遺墨（二）

目 錄

一	一个实事求是的性格的形成与發展	1
二	戴震哲学思想的來源	11
三	戴震的自然觀——天道只是“氣化流行”	17
四	戴震的認識論——离客觀的“物”談“理”，必只是主觀的“意見”	41
五	戴震的社会道德論——“必然”与“自然”合一，“理”与“欲”合	53
六	結束語	71
	附錄：研究戴震思想的參考資料	77
	后 記	82

一 一个实事求是的性格的 形成与發展

戴震是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最鲜明的唯物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战士之一。

他是在1724年（雍正元年）生于安徽省徽州府休寧縣。字慎修，又字东原。他的父親靠族人幫助，經常在江西南丰縣作小布商[●]。家境極苦。他在十八歲時，曾隨父親到南丰，靠教幼童維持自己的生活。二十歲時回休寧家，刻苦讀書。二十二歲即開始著作，以後几乎每年成書一、二種。三十歲時，因為生活困難，曾至友人汪梧鳳家教幼童。三十三歲避難去北京，寄居徽州會館，常常三餐不飽。但却結識了京中一些進步人士。很多人知道他对科学及經学、文字学有研究，都來訪談。当时，他大半仍靠教授幼童維持生活。以后为生活与學問，往來于北京、揚州、山西之間。屢次会試，都因他

-
- “明末流寇之亂，僅地以僻處山中，独獲完善，休养生息，至乾隆朝，故徽屬最稱殷富。維时族之人多務商業，以豪侈相尚，虽未知为学之道，而故家大戶藏書頗富。公父為族人經營布業于江西之南丰。家素寒，無力購置之本，多向族人假借。”（“轶事”，引自魏建功：“戴东原年譜”）

的思想和統治者要求不合，未得考中。他五十一歲時曾在浙江金華書院作主講。當年北京開設四庫館，戴震以特召赴京充纂修官。在館中工作了四年。他是在急於想脫離四庫館回鄉的情況下，在北京死去。

戴震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學者。他的學問與性格，是當時社會的進步方面的反映。他的小環境休寧縣，雖然山多平原少，但因為出產茶葉及其他關係，人民多向外發展，所以對於大城市的文化，吸收很快。當時茶葉是出口貨，常與外國人發生直接或間接關係，因此易與國外文化接近。

據記載，戴震十歲時讀書，就能過目成誦，並能提出獨到見解。有一次，老師教完“大學章句”的“右經一章”，他便問：

“何以知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道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這是朱熹的注解上所說的。”老師回答說。

“朱熹是什麼時候人？”他反問。

“宋朝人。”

“孔子、曾子是什麼時候人？”他又問。

“周朝人。”

“周朝與宋朝相隔有好多年？”

“挨近二千年。”

● 他的學生段玉裁所作“戴東原年譜”，特別標出六次“會試不第”。其意在表示當時考選制的不公道，也揭露當時統治思想對於異己思想的殘酷壓迫。

“既然相隔二千年，朱熹如何能知道是如此？”❶

戴震就在这么年幼的时候，已經有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讀詩經的時候，讀到“秦風”的“小戎篇”，便立刻繪出圖來，使觀者驚奇其了解的詳實。那时，他只能在書本上用功夫，所以總是在文字上力求切實。每一字都求了解透徹。弄得教他的一些老師都無法應付。後來老師只好直接向他講“許氏說文解字”。他學了三年，把所有節目都記憶和了解了，再又取“爾雅”、“方言”等書及各種注解，細細研究；對每一字，不僅根據六書，而且直接與群經貫通。因此，他不僅學會了文字學，並對十三經的注也弄熟了。

這時，他不過是年紀十六七歲的少年。他從這些切實的研究中，還悟見這一道理：即經書的最高原理是“道”，但“道”的表示必通過辭，辭又由字組成。這樣，要了解經書，必先從最基本的“字”研究起，然後由“字”的正確了解到“辭”的正確了解，最後達到“道”的正確了解❷。他認為宋代唯心主義者瞧不起訓詁學、瞧不起語言文字的研究，這是等於想過江而不要船、登高而不用階梯。

戴震從文字學還深入經學，使他的眼界更為廣闊。因此，

❶ 這故事，最早見于洪榜（初堂）所記“戴先生行狀”。以後段玉裁所著“戴東原年譜”，以及王昶所撰“戴先生墓志銘”、江藩作“國朝漢學師承記”，均記載這故事。

❷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段玉裁：“戴東原年譜”；戴震：“古經解鈔沈序”，“與是仲明論學書”。）

他把文字和制度名物放在一起，認為這是通“辭”、通“道”的关键。他雖然未進一步認識到字義和制度名物均可作為客觀的社會現象來研究，但也能見出二者的关系。這不僅使字義本身的研究變為客觀的，而且他深信經中之“道”，也必寄於客觀的社會政治制度。這使实事求是的思想，又推進一步。

从此，戴震的实事求是的方法，首先應用於文字學和經學範圍內。我們在這裡必須注意的，是戴震自始即僅以研究字義為出發點，並非是最後目的。他的最後目的，本是在“聞道”。早年，他也許在“聞道”方面用的功夫較少，但以後戴震思想的發展中，“聞道”的地位却逐漸變得更重要。所以他的主張，並不能為許多拘拘小儒——只知在文字圈內打轉的人——作掩飾。

戴震雖然在文字學、經學上做了一番切實功夫，但他的切實方法，還不止於在這個小範圍內。他後來又推廣經學及於自然科學、工學；推廣古學及於西洋學問。他在二十歲時，曾根據西人的龍尾車法作“贏旋車記”，又根據西洋的引重法作“自轉車記”。

他在這種孜孜不息的研究工作中，忽然遇見了大學者江永（慎修）。那時江永已過六十歲，不僅以經學——特別是三禮——聞名于世，而且在數學、天文、音韻、地理各方面

● “先生丁酉正月與玉裁書曰：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段玉裁：“年譜”）

很有成績。也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学者。戴震一見江永，便傾心崇拜，立即把自己著作請求江永教正。不論江永和戴震是朋友关系或师生关系，無疑地戴震是深受江永思想的影响的。他不僅自己去請教，而且还約集了同郡友人汪肇龍、鄭用牧、金榜、程瑤田、方矩等去請教。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学派。戴震的实事求是的性格，也在这条件下成熟了。

尽管这一时期，戴震的物质生活是异常困苦的，但并没有挫折他的研究精神。他曾經替朋友汪梧鳳教幼童，以求一饱；曾經“家中乏食”；曾經为了逃避本鄉惡霸，孑然一身逃至北京，結果，連每日粥食都不能維持。后来，好容易在王宅教幼童过生活。但是，就在这些时候，我們的实事求是的学者戴震，不僅教出一位幼童王念孙成为清代大漢学家，不僅有很多大学者如段玉裁等來拜門求学，而且还著成了很多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我們試把他在这十二三年間著成的書列为下表：

“筹算”，一卷，二十二歲时作；

“六書論”，三卷，二十三歲时作；

● “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鐘律、声韵、地名沿革。博学淹貫，巋然大师。先生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學就質正焉。

江先生見其盛年博学，相得甚欢。一日舉歷算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所疑，十余年未能决。’先生請其書，諦觀之，因为剖析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驚喜，嘆曰：‘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嘵江先生之學周詳精整。’（洪榜：“戴先生行狀”）

“考工記圖注”，二卷，二十四歲時作；
“轉語”，二十章，二十五歲時作；
“爾雅文字考”，十卷，二十七歲時作；
“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三十歲時作；
“詩補傳”，三十一歲時作；
“勾股割圓記”，三卷，三十三歲時作；
“金山志”，三十五歲時作。

他在这时期的的基本思想，可以从他当时給朋友們的信中得以知道。他虽然仍主張“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但着重点，已放在“道”上。他說：“有一字非其的解，則子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他并責备只知注重文字文章而不講“道”或义理的人。他說，君子惟以聞道为务，那些只善于文章考核的人，都未尝有志于聞道；这种人，即使講“道”，也必穿鑿附会，先入为主，積非成是而不自知。戴震在此最大的發見是：凡在这問題上有錯誤的人，必定会以私見为古人之見。其弊病，与講“道”或义理而不知重文字的人所犯的錯，是一样的。在戴震的意思，文字与义理，不能孤立而論，二者必須結合。他更認清楚当时在政治上犯錯的人，也反映在文字和义理的誤解上。他以为宋代以來学者及政治家，明明是自己私見，偏說成是古聖賢的意思。其方法是：不管古人語言文字如何，只要抓着一二可附会的

● “与某書”（“戴東原集”（下簡稱“文集”），卷九）。

字句，便附会下去，結果，一处事，便把自己主观所决定的“理”，自以为合于古人文理，强断实行，对于事情原委隱曲，絲毫不管。結果便造成天下大亂。戴震在這裡，就从學術上的实事求是，一轉而為在政治上实事求是。他很痛心地攻擊當時政治是動輒以“理”殺人。他為真理呼冤，也為一切政治上的遭受不平等待遇者呼冤！戴震就在這種呼冤聲中，使他的思想接近了人民，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呼声。

戴震即於此時在揚州得識經學大師惠棟（定宇）。他佩服惠棟講經的方法，認為惠棟是他的知己。他後來做了一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順着惠棟的意思，把“故訓”與“理義”視為不可分離，認為研究“故訓”，就在于弄清古代典章制度。而古代的“理義”，也存于典章制度內。這是最實在的根據。

戴震雖然一方面叫人“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似在故紙堆中打轉，但是，一方面也知“株守旧聞而不复能造新意”的毛病[●]。所以，在他看來，求“古”與求“是”是合一的，故訓與理義是合一的，信古與創造也是合一的。他不但重視考核，也重視義理的發見。從這時起，繼承惠棟，開始注意“禮記”，由“禮記”而知“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皆是一貫。他稱這七種書為“七經”。他想把其中一貫的道理，寫成“七經小記”。這計劃未完成。但是戴

● “与姚孝廉姬傳書”（“文集”，卷九）。

● “春秋完遺序”（“文集”，卷一〇）。

震在三十五歲以後的思想，顯然是以此為中心的。他後來曾參加四庫館，作了一些校勘考訂的工作，這只是應付場面的工作。他真正用心所在，還在於想完成“七經小記”。

可惜戴震死得太匆促。他只作成“原善”、“原象”二篇，“學禮篇”與“水地篇”也只完成一部分，其他二篇還未動手。幸好“原善”一篇先成，他的中心思想得到表現了。這時，戴震約是四十二歲。

戴震發展他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至此，不能不有系統地和空談性理以及以理殺人的唯心主義者——當時的宋明理學信徒們——相鬥爭了。他在“原善”書中，指出空談性理的人，都是現實的黑暗政治的帮凶。他認為善與性，通乎客觀世界，由天地之常與天地之德，可以見出善與性的根據。即是說，我們必須運用充分的理智去研究客觀現實，然後可知善與性之所在。這種重視客觀現實的精神，逐漸形成了一唯物主義的哲學系統。後來推進一步作成“緒言”，這書雖是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証”的初稿，但是他的唯物世界觀，却在這本書內完全達到成熟，構成一個嚴密的系統了。

戴震從四十三歲左右就開始寫“緒言”，接着就改寫成“孟子字義疏証”，以後隨時修改，直至五十五歲死前不久，才算完全改定。這是一部精心結構之作，雖然全書不過四萬字左右，但每個字都經過千錘百煉，不愧是一本實事求是的哲學書。

戴震的科學精神，因為他認為必須從文字謹慎下手，每被人誤會為只重文字，或在講“道”、理時只局限於文字界說

之中。有些人，讀了戴震的哲學書，見其中多是一些“某者某也”的定义辭句，遂以為戴震的功績不过是把歷來哲學上概念弄清楚明白而已。这是大錯。戴震后期精神，远超出这种局限。他的書，是想使“古賢聖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这一意思得到充分實現，所以他把注重点放在“情”、“欲”、“理”三者关系上，要使一切講“理”的人——特別是統治階級，要設身处地为人民的情欲或实情着想。人民的情欲是客觀的，因此，理也是客觀的。戴震是从这种主張建立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所以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不但是实事求是，而且充滿了战斗精神。無怪他臨死前致段玉裁信上說：“僕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証’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尽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証’不得不作。”

戴震一面很痛恨当时統治者，一面又在四庫館內替統治者工作，他的内心是苦痛的。無怪他时时想辞职回鄉休息●。正当要起行时，足病阻止了他。他以为足病是可以好的，不料由足病引起其他病，就死在北京了。

臨死一刻，只留下这样几句话：“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这正是他和当时佛学大师唯心主义者彭允初論辯后不久的时候。他所謂义理之学，就

-
- “丁酉四月作札与玉裁云：僕足疾已逾一載，不能出戶。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实不复出也”；“丁酉五月二十一日作書与玉裁云：……归山之志早定，八月准南旋。”（段玉裁：“年譜”）
 - 王惕甫“未定稿”，引戴衍善所述。又見于焦循（里堂）著“雕菰樓集”“申戴篇”。

是他生平坚持的唯物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拿这种精神來养心，無怪他能一生坚持真理，并頑强地和唯心主义斗争。他以这种义理來养心的时候，心是乐观的，勇敢的，生气勃勃的。这种从唯物主义养育成的精神，永远不朽！

二 戴震哲学思想的來源

戴震在生活上逐漸形成一实事求是的性格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这种性格和思想，如果細細追究其來源，可知和当时社会大环境是密切联系的。

戴震生活的年代，是1724年（雍正元年）到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这时期社会，对于戴震的生活与思想發生影响的，有三点：

第一点是：当时社会中的資本主义生產要素的萌芽。本來，資本主义生產因素，在明代已經开始萌芽，但是，由于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戰爭，使整个國民經濟都遭受破坏，当然連資本主义生產因素的萌芽也遭破坏了。直到清朝統一了中國，費了几十年的經營和整頓，到戴震在世的雍正、乾隆时代，才可說好轉了，恢复了明代極盛时期的經濟繁榮。隨着，資本主义生產的因素，又顯出了萌芽，特別是在出口貨物如絲、茶、瓷器的出產区安徽、浙江、江西等省，最为明顯。戴震生長在安徽茶業中心地休寧縣，因此很容易地便和这个萌芽因素發生了关系。他的族人多是經商的❶。他自己

❶ “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为居，商賈东西，行官于外，以就口食。”（戴震：“戴節妇家傳”）